

(三) 老战士篇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明

现任中共钦州地委老干部局局长王朝明，原名王振煊，曾用名王子秋，十四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因而许多老同志都称他为王仔。

他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1924年12月出生在贫民家庭，30年入北海三小读书，36年9月至40年7月就读于合浦一中。中学时代，他在地下党员赵世尧、庞继业（庞达）等同志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读书会、少年儿童剧团等进步团体，读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开始从学校走向社会，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38年5月，王朝明积极参加了反对叶天一任一中校长的斗争。当时，中共合浦特支获悉思想反动的叶天一将接任一中校长，为了继续占领一中这个阵地，紧急决定拒叶接长一中。于是，在进步报纸《合浦日报》上揭发叶的劣迹，发动学生抵制叶进学校，动员进步师生向县政府请愿。合浦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收回成命，另任周胜皋为校长，周聘请了陈任生、韩瑶初任教员，一中拒长斗争取得了胜利。

日寇侵占涠洲岛后，北海形势吃紧，党组织推动抗敌后援会组织战时服务团，成员多为党员和进步学生、青年。王朝明也参加了战时服务团，和同志们一起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群众疏散，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他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于39年2月经何正四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战时服务团解散，党组织决定王朝明重返合浦一中（当时校址在小江长塘山）复学，一面读书，一面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与广大同学一起，开展反对学校当局镇压学生爱国活动的斗争。40年下半年，合浦县当局下令一中分校迁回合浦平田。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决定王朝明留在小江一个时期，担任县委机关与白石水区委之间的交通联络，他不怕艰险，多次安全地把县委以及上级的指示带给区委，及时指导了武装自卫斗争，受到县委领导的表扬和鼓励。

41年2月以后，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先后到合浦石头埠小学、灵山横山头小学、合浦南康雷公屯小学、白沙宏德小学、上廉香山小学等校，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传播革命种子，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45年2月，王朝明响应上级党的号召，参加了白石水（大成）武装起义，曾在合灵地区游击队担任过文化教员、政治教员、政治指导员、武工队负责人等职。47年年底，他奉调到十万山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转战在大山南北，为扩大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一直坚持到解放。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一团组织股长、十万山东区工委委员、二十一团独

立营教导员、上思东区区委副书记、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上思县工委委员等职。

解放初，王朝明任钦县县工委委员、党工组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50年进华南党校学习，51年1月调返钦州地区工作，曾任地委政策研究室农村科科长兼专区土改委员会调研科科长，防城县委秘书、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广东廉州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合浦县委宣传部长，十万山劳动大学负责人，钦州地区师范党总支副书记、地区教育局副局长等职。王朝明长期战斗在教育战线，早年还被评为教育工作特等劳模，为发展钦州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84年年初，王朝明调任地委老干部局局长，现年近花甲，仍精神矍铄，决心发挥余热，热情为广大老干部服务，为四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宁章毅

宁章毅，1921年11月出生于合浦县（今浦北县）小江乡北河坡村，父母亲是手工业者。他在家族里排行十八，大家都爱称他十八佬，曾用名李生。

抗日战争之初的38年秋天，日寇的铁蹄蹂躏涠洲岛，北海，廉州及沿海一带，常常遭到日机轰炸，廉中、一中分校被迫于38年冬迁址小江，长塘山。在两校内的大批党员骨干随之转移到小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活动中培养发展农村党员。宁章毅于39年11月经卢文、陈冠庸介绍入党，他同宁业富、宁业华，陈家贵等，都是小江地区最早的一批农民党员。

宁章毅入党后至44年底，主要负责秘密交通联络的任务，他经常往返于公馆，廉州、寨圩、灵山等地，经历了无数次艰难险阻，顺利地完成了送信、护送过往的领导和同志等任务。

45年2月，宁章毅参加了小江起义。宁业富、宁业华、刘信汉和宁章毅等人负责攻打小江镇驻北河坡四姓宗祠的自卫中队，他们利用狗肉宴把自卫队的头目灌醉之后，以里应外合的战术，率队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全歼，缴枪三十多支。起义后，他们汇合小江各处起义队伍，整编为小江龙门人民抗日游击中队，转战于小江、白石水、灵南及合博边等地，后改编为小江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宁章毅任司务长。同年五月间，小江大队转移到灵东南芳龙地区，同灵山、灵南等地起义队伍汇合后，为避开强敌，保存实力，西进十万山建立新的根据地。队伍于六月间西进，宁章毅随队出发，途中粮食缺乏，敌人前堵后追，经过七昼夜的艰苦战斗，未能到达原定的目的地，部队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严重，被迫中途折返灵东南，一面休整，一面相机打击敌人，坚持了七、八个月的斗争。同年底，小江大队奉命返回小江老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47年秋冬间，小江部队奉命北上，支援横南起义部队。宁章毅调任十九团四营（横南独立营）十一连指导员。年底，他又奉调到灵西那楼地区，任区委书记兼灵西大队

指导员，为开辟和巩固那楼、那陈地区游击根据地，艰苦战斗了两年余，一直至解放。

解放初，宁章毅先后在钦县县城、寨圩区、北海镇、合浦县委搞组织、保卫工作。从50年年底起，曾任合浦县总工会筹委主任，北海市总工会主任、主席，北海市建港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兼政工科长，北海市工业部副部长，浦北县委书记兼县长等职。

在58年，那场反地方主义的政治风暴中，宁章毅也难以幸免，被诬为浦北县地方主义后台，遭到撤职、行政降四级、开除党籍的处分，下放到合浦农科所、雷州林场等单位劳动，屡遭折磨。79年11月，经广东省委批准，撤销了58年对他的处分，恢复了党籍、原工资级别及政治待遇，任雷州林业局副局长，81年6月调返北海任政协副主席，直至现在。

叶崇业

叶崇业是合浦西场地区坚持了十年艰苦的地下斗争的老同志之一。

他是现今合浦县西场镇九指囊村人，1917年8月出生，因家庭贫困，只读过私塾和四年小学。他参加革命后曾用名文留，别号亚叶。

38年，罗秉乾（罗刚）、罗秉森（朱明）等人回西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西场青年、妇女等抗敌同志会，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叶崇业积极参加了活动，并亲自组织成立九指囊、白水井青抗分会，39年8月，经黄人彩、王贵德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40年2月西场区委发动群众召开各界反汪救国大会，声讨西场地区反动头子陈南运米资敌的罪恶。陈南派兵镇压群众，叶崇业积极参加了请愿斗争，进一步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曾任西坡岭、九指囊村党支部书记。从41年至44年合浦革命斗争处于暂时的低潮阶段，叶崇业根据党组织的布置，到犀牛脚东乡当盐工，秘密开展党的群众工作。

45年2月，叶崇业作为党员骨干被委派打入西场镇自卫中队任班长，他通过工作掌握了一些进步士兵。3月，西场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他有力地作内应，起义队伍全歼敌自卫中队，缴获了七、八十支枪和一批子弹，同时智取了敌西场警察所。西场起义后，队伍整编为西场大队，下编三个中队，叶崇业任中队长。不久，南路西进的二支队在谷埠受挫，向西场转移，西场大队与二支队汇合后，敌465团、合浦反动武装并钦廉师管区部队从三面压向西场地区，我方队伍被迫东撤高雷地区。叶崇业也随队东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重兵推向南路，南路特委把在雷州半岛的合灵部队整编为合灵独立营，下辖西场连、南康连、白石水连、灵山连，叶崇业任西场连排长。同年冬，西场连斗争受挫，部分骨干转移他处，叶崇业、包恭和王六安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本地区开展斗争，逐步恢复地区，扩充队伍，活跃在合钦灵边广大

地区，直至47年夏天发展到一个建制连（二四团三连），叶崇业任该连连长。在开辟和扩大合钦灵边根据地的斗争中，叶崇业和包恭等同志作出了很大

合浦解放后，叶崇业历任合浦县大队侦通参谋、钦州军分区二五团侦通参谋、钦州军分区补训营连长兼指导员，浦北县三区武装部长、合浦专区贸易公司秘书科长、浦北县土产公司经理等职，77年离休。

卢冠群

卢冠群同志是北海市人，1915年12月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39年6月入党。她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是北海早期参加革命的几位老大姐之一，也是许多人都熟悉的“卢姐”。

1926年9月她开始就读于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平民学校，同届入学的几十名女学生均由校方统一安名字，废除了封建族谱的那一套旧习，学生的名字都带着一个“群”字，她因而得名叫“冠群”。大革命失败该校停办，她转学高德小学，北海女小，后考入合浦一中，于1934年6月初中毕业，因家贫无法升高中而走上社会就业，曾从事过女小的图书管理员、家庭教师、小学教师等职业。中学时代，她受进步青年苏觉民、蔡铭等人的影响，阅读了他们收藏的“左联”出版的书籍，因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抗战开始后，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任北海妇女抗敌后援会委员，协助妇抗会开展各项工作。为了建立抗日小后方游击根据地，1939年2月随何醒予等人一起被派到福旺山区，以做家庭教师为掩护，发动妇女参加识字班，开展山区的抗日救亡工作。为了加强以白石水区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设，1940年2月党组织抽调她到柑子根小学教书和李英敏、朱兰清、王克等人一起工作。同年5月间白石水武装斗争开始后，她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有一次曾因送情报给李英敏途中碰上敌人而被捕，但因搜查不出证据而释放。1941年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恶化，2月间组织上彻退她到越南先安华侨小学教书，下半年为开辟十万大山根据地调她回防城光坡小学教书，后因工作暴露，于1942年2月转移到湛江地区的化州、梅菪、吴川、信宜等地教书，同期间参加了南路的武装斗争。抗战胜利后，敌人加强兵力扫荡南路游击区，1945年9月她又重新撤退入越南，在黄作兴资本家开办的缸瓦厂中协助管理账目，她从中“拿”出一部分货款交给组织，解决革命活动的经费困难。十万大山区发展壮大武装斗争后，她于1947年6月调回游击区任洞中区党支部书记。当敌人封锁扫荡山区时，她于1948年3月撤回白石水区，继续坚持参加武装斗争工作。1949年5月建立张黄区委时，任组织委员。

解放后，她于1950年4月任张黄区代理区委书记，搞支前工作，后期参加西场区的剿匪。1951年2月任合浦县妇委书记、钦州地区妇委委员。1952年2月参加白沙土

改试点和铺开后的常乐、白石水区的土改。1953年6月任浦北县妇联主任，参加县委。1955年10月任合浦专区妇联主任。1957年6月任合浦专区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1958年9月任乌家农场党委书记。这期间正值农场发生因灾荒饿死人事件，上级片面认定是她的“严重失职”，从而错误作出撤销其担任的领导职务，调到湛江地区荣军疗养院任院长兼书记，实际上是放到一个小单位降职使用，但表面上仍保留“县级”待遇。1970年6月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刮了一阵子的“双退”风，她被过早的强迫退休回到北海原籍，1978年5月才改为离休处理。由于工作岗位变动的频繁，她徒步跋涉转移过许多地方，经历了漫长的艰辛战斗岁月，长期的工作劳累，造成身体十分虚弱，疾病缠绵，面临风烛残年的晚境，她仍像一根红烛，是个能牺牲个人利益的人，一个思想纯朴的老党员，为党埋头工作。

冯彪

冯彪，原名冯显维，原合浦县小江乡沙江树人，1922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

从1939年至1944年，冯彪先后在小江镇中心校和福旺二中读书。当时小江、福旺是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地区，党组织有雄厚基础。冯彪接受革命教育影响，倾向进步，1941年12月，经冯日升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冯彪一面读书，一面从事党的活动。

1945年2月，他参加了小江的武装起义，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后在小江游击中队、游击大队、小江独立营、小江武工队担任过政工队员、班长、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营长、武工队长等职，坚持长期艰苦游击战争，直至解放。

解放后，在合浦县田粮处、征粮工作队、合浦县支前司令部、25团等单位担任过主任、队长、参谋长、军务参谋、组织股长、政治处代理主任等职。在支援前线、解放海南和剿匪反霸等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

1952年3月以后调离合浦，在钦州、北海、陆川、巴马县兵役局和武装部，担任过科长、武装部副部长等职。

1963年4月以后，在钦廉林场任过党委办公室主任、革委会主任。

1973年以后在101单位452处任革委会副主任。

1982年以后，在合浦县粮食局任副局长。

冯彪同志是浦北较老的党员，几十年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工作认真负责。

冯德（自传）

冯德，原名冯廉先，又名柳戈。1917年出生于现在的广西合浦县闸口乡山子背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父母务农兼挑柴卖为生。有兄弟五人：烈士冯道先是长兄，次兄是

冯异先，我是老三，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时，随兄冯道先教书之便在北海读小学。

大革命时期，有一批共产党人来到合浦，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哥哥冯道先于1926年被任为合浦县女子小学校长，我又随之就学于合浦县一小，那时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各项各业的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近郊农民也组织了农会。在那时经常开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特别在红五月，群众集会更多，我常在合浦中山公园大会台前的队伍里，聆听革命前辈的宣传鼓动和报告，自己从中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

1929年秋，考上了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初中，在进步教师杜君恕，杜君慧（党员）和冯道先等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开始得到了进步。

“九一八”事变发生，特别“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和人民群众对日寇侵略的抗战，震撼了多少青年学生爱国的心灵，开始读点马列主义书籍，寻求救国真理。

为了响应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合浦一中学生在赵世尧，苏觉民和我的组织领导下，组织学生纠察队，分成若干小队，轮流出港口检查日货，走向社会做抗日救亡工作。

1932年末至1933年初，我们团结了一部分同学共同学习进步书籍，秘密成立“未明读书会”，成员有赵世尧，冯廉先、陈锡贞（女）、黄铸夫、王元瑞、王文崐、李俊山等。由赵世尧当领导，我具体负责管书报代售工作与上海联系购买进步书刊。我喜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和苏觉民、罗绍周等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并把学习心得写成讲话形式的文章，在学生刊物《新潮》上发表。也曾与艾思奇同志通讯，请求指导如何学习哲学，有些问题，他亲自复信解答，后来收集在他的著作里。

“未明读书会”通过上海书报邮售社的关系，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知道党在上海的出版发行局，负责人是王均予同志），他给我们寄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报纸《红军捷报》、《抗日宣言》等等。我把这些党的报刊除传阅外，在半夜里和庞国泰、李俊山等把它张贴在北海的街头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后来又收到林伯渠、董必武主办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附有中文），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上海公开出版的《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李公朴、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我大力向同学们介绍购买和订阅，推动读进步书籍，起到很好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这期间，党在文化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我们马上响应号召，赵世尧和我就发起在一中办拉丁化新文字班，参加学习的进步学生四、五十人。1935年黄万吉同志从广州回来，他在广州学了世界语，我们又邀请他上课，办了世界语班，也有四、五十人学习，“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另外，还开办各种民众夜校，教识字和唱

救亡歌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还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工作。“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北海学生闻风响应，我和苏觉民等商量，决定发动北海全市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响应“一二九”运动，在十二月底的一天，举行了有二千人之多声势浩大的游行，并以大会名义通电响应。“未明读书会”在北海学生进步运动中实际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1935年，我毕业于一中高中师范科，执教于北海三小，但仍住在一中宿舍，直接领导着合浦一中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秘密举行时事座谈会，参加者有郭芳、王文崐、庞自、林朗天等十多人。高初中各班读进步书籍成风，宣传抗日救亡，各班都办有油印小报，校园里进步势力十分活跃。

1936年六、七月间，抗日新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要进驻北海，事先派来钟俊生同志（党员）找赵世尧和我联系，说要发动群众欢迎抗日部队到来，配合抗日。赵世尧负责总的指挥和领导，我负责发动各小学师生工作，苏觉民、庞自、吴世光、刘雨帆、耿宪修、程敏德等负责一中学生的发动工作，王文崐、周志刚，黄人善、庞国泰负责发动社会上各界群众工作。热烈欢迎翁部进驻北海抗日前线。

9月3日，北海发生名闻中外的刺杀日谍中野顺三事件，翁部顺应群众的要求，派出便衣人员，将罪恶多端的日本间谍杀死于他的“丸一药房”里。其子逃出中山路上被周志刚、程敏德和我追捕未遂，逃入法国领事馆去了。

后来蒋介石派广东军159师进驻合浦北海一带，翁部被逼经钦州退往南宁。北海一批青年学生参加部队，随翁部到钦州。有王文崐，黄裕起，庞国泰、罗秉乾、罗秉森、程敏德和冯廉先等二十人，准备派到连队去做政治工作的。

北海在1937年1月7日发生“一七”事件。国民党反动军队159师950团，在三小把我逮捕了。同一天又包围合浦一中，将正在上课的吴世光、庞文隽、张家保、陈广材、耿宪修、岑嘉毅等十余人，一个个也捕了。我被关在团部的地下室里。后来知遭香港报载：“北海破获人民阵线组织，为首冯某被捕”。敌人经过严讯，追查所谓共产党组织，一无所获，被捕者先后释放了。

是年秋，进步人士石端出任合浦五中（公馆）校长，何世权、张九匡和我在一块工作，除向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外，晚上到近郊农村组织农民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为日后群众革命打下基础。

1938年秋、赴梅菪，在我党老党员陈信材主办的进步报纸《南声日报》任编辑，与苏觉民、吴世光、刘雨帆、杨子儒等同志，一同编辑发行这份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我既当编辑又兼卖报童。

1938年底，报纸暂停刊，陈信材率领我们到高州参加爱国抗日将领张炎的广东高州十一区游击司令部工作。他当时招收四百名抗日进步青年组成“乡村工作团”，后分

为六个队分别深入高州属六个县农村，宣传发动农民抗日救亡。陈信材和我分别任正副队长，带一个队到吴川，有队员成百人。以吴川塘缀为基地，并邀请当地著名民主革命老人八十高龄的杨爵堂先生参加我们的队伍。他在吴川很有威望，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都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吴川县不大，从北到南，每个乡村差不多都有过我的足迹，为了抗日救亡，不辞劳苦，走遍村村寨寨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为以后武装斗争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9年7月间，张炎将军又组成学生队成千入，集训时分为九个中队，设营在高州红花庙，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学生队总队部政治处负责人是阮明同志。我和吴世光、陆新等同志都任学生总队的政治教官。我除上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外，还兼任第九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黄景文等同志则上军事游击战课程。阮明、吴世光和我就住在红花庙的一个宿舍里，朝夕相聚，共同战斗。

张炎被国民党排斥下台后，我离开高州，后由吴世光介绍，到安铺中学附小工作。1942年夏，谢王岗过安铺告诉我，国民党有令通缉你，最好离开这里。我和吴世光商量决定转移。

不久，我到了广东乐昌，在县城小学教书，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3年7月在韶关考入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读书，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活动。

翌年夏，日寇侵占广东战时省会韶关，我撤离回到广东化县，遇见罗英同志，被介绍到化县一中任教，是年冬参加南路武装起义，和陈信材、朱明、曾伟等同志在吴川张炎领导起义的武装部队宣传部工作。

1945年底与庞自同志等转到越南去，由庞安排到河内《新越南》报任编辑工作，后又做华侨援越抗法工作。1948年初到部队独立中团任团部秘书。政委是庞自，团长是黄炳。

1949年6月在部队由庞自和罗英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独立中团改编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由庞殿勋率领部队返十万大山地区参战。庞自、罗英、周剑华、叶平和我等二十余人则返回祖国云南，参加滇桂黔边纵队，我分在边纵四支队饶华部下政治部工作，直至云南解放，在滇东南专署和后来的文山专署任文教科科长，搞文教工作。1955年9月至56年8月，组织送我在北京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第一期学习毕业。57年至58年任文山地委文教部副部长。

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降级，降职处分，下放劳教农场当生产队长劳动改造三年。摘掉帽子后，分派到富宁县一中教书。人生宝贵年华，一晃又过了二十年。

三中全会后，79年4月2日，中共文山州委对错案予以改正，得到三恢复。送云

南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回文山，分配在原单位，任文山州文教局副局长。83年9月退居三线，仍发挥余热，做点社会教育工作，并为报刊写点文章或革命回忆录。

1985、3、11、写于文山

李 通

他是长期在合浦从事武装斗争的战士。

李通，1925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吴川县上能村一个革命家庭。他父亲李玉轩是早期共产党员，1924年在广州农民讲习所任警卫团(?)团长。李通从小受父亲影响教育，1938年他哥哥吕克奔赴延安，对他推动影响更大。

1941年在地下党员黄泽生的亲切教育下，李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经杨子儒，陈宪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王国强、黄明德、周亮等同志领导下，组织世德学生开展军事训练，主办农民夜校等抗日救亡运动，他担任世德学校学生会主席。

1944年冬，吴(川)化(州)廉(江)三县举行武装起义，他充当学生队长，后来黄景文调他下连队，担任马俊英中队指导员。高雷二支队西进六万山失利撤退时，他留下和陈明景一起，坚持白石水武装斗争，担任苏显枢中队指导员，后任苏显枢大队政委，灵山县工委委员兼横南独立营教导员，新六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四支队第十团政委。解放后调任钦州军分区转委会组织科长兼分区宣传科长。在抗美援朝中，任47军201师402团副参谋长。1952年调总参动员部当傅秋涛的秘书参谋，战时动员工作组组长，军委批准为战时随毛主席行动的动员参谋。1966年建立基建工程兵时，任参谋处长。

在“文革”期间，他对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不满，说了一些不满林彪、江青、康生的话，被打成反革命。1967年3月初，林彪四人帮揪斗陈毅最紧张时，李通写了一首诗给陈毅“断头将军不断头，将军大义凛千秋，敌人反对我拥护，公推陈总卫神州。”李通的言论和诗被林彪江青获悉，十分恼恨，就下令逮捕李通，先关在北京秦城，后关押在贵州监狱，江青咬牙切齿要处死李通。林彪、四人帮先后垮台，中央有关领导为李通平反。

因李通和傅秋涛一起工作过，傅是彭德怀的好友，在“文革”中，李通又被打成“彭德怀孙子!”。这正是人间多少荒唐事，留待后人说笑中。

李 洵 祥

在珠城，有一位身残心红的抗战时期老战士，他就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原廉州中学党支部书记李洵祥同志。

1920年9月8日，李洵祥出生在合浦县南康镇下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因为家境贫困，他的三个哥哥、姐姐幼年就夭折了，他十三岁才能进私塾念书，十五岁转入外国教堂办的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小，父亲多方借债供他读书。高小毕业后在学友的资助下报考初中，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合浦三中（现南康中学），父母亲将家里仅有的一亩多地典当给他交了学费。

李洵祥从小追求上进，1937年他读六年级时，抗日烽火燃烧起来了，他是小学儿童市政府市长（学生会会长），经常组织学生逢圩宣传抗日救亡。初中阶段，他当了三年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学生投身到宣传抗日救国的洪流中。39年夏秋，南康爆发了反对奸商李仲谦等运米资敌的斗争，他是一个积极分子，带动学生纷纷参加。同年秋天，他又同进步学生一起配合校内的进步教师，掀起驱赶反动教导主任罗家玮的学潮，结果把罗赶跑了。这一年的寒假期间，卢文回乡进行革命活动，把《今日的红军》、《毛泽东奋斗史》等进步书籍借给他阅读，他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从此更加向往共产党。

40年5月，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南康地区发起组织“南康各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李洵祥在这一活动中，大力宣传党中央关于“三坚持、三反对”的抗战方针。过后不久，他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是白石水人民武装自卫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南康区党组织负责人张家保的直接领导下，他认真刻印、广泛散发宣传资料，宣传我党领导下的白石水武装斗争的起因、实质，揭露反动当局武装镇压白石水人民抗日行动的滔天罪行，大造革命舆论。是年八月，他参加了合浦中心县委先在西牛脚、后在南康举办的党训班，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使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九月，他担任合浦三中党支部书记，直至次年“皖南事变”后，合浦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他才奉命转移到白石水、北通一带搞群众工作。从42年至44年，他在南康、婆围等地以教师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45年2月，南康武装起义前夕，他奉命前往白石水，向上级党的负责人汇报南康党组织准备提前起义的情况，并作接应起义队伍的准备工作。南康起义后队伍向白石水、大成老区转移了，部分起义人员在战斗与转移中失去联系，党组织又派他重返南康，千方百计联系失散人员，开展对敌斗争。5月，原南康区党组织负责人陈符隆率领游击队东撤高雷地区，由李洵祥接任南康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不畏艰险，团结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勇敢地坚持斗争。

46年7月，李洵祥任合灵南游击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由于艰苦的游击生活，他患了严重的骨髓炎，在敌人疯狂扫荡的环境下，缺医少药，无法治愈，转移到冲掘洞、道歌北一带治疗一段时期后，被迫离队休养，解放后截去了右腿，因公致残，系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合浦解放后，李洵祥曾任县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县人民医院秘书、县人委卫生科副科长、县人委秘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合浦日报》副主编、南康中学、西场中学、廉州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他还曾被选为中共合浦县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委员。他较长时间战斗在教育战线，身残志坚，为培养祖国建设人才，呕心沥血，堪称模范。

李耀东（自传）

我192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北海市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几天以后，按照教会的规矩受了洗礼。儿童时期就生活和受教育于教会围墙之内。在我的心灵上也同时筑起了一道与世隔绝的围墙。十二岁到北海市第三小学校重读四年级至1936年夏高小毕业，开始走出教会的围墙和内心的围墙，初步接触到广阔的人世。

高小六年级时，学校来了进步老师冯廉先、苏少琬，他们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苏联的情况，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使我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思想上开始懂得考虑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问题，向往没有压迫剥削，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的新社会。我还第一次听到“猴子变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学说。这如同一粒种子播进了我的心田，日后终于适时萌发。

1936年秋，我考上合浦一中。抗战开始后，读到初二上学期，因病辍学一年。1939年春，我复学到大石屯读书。秋天，小江分校迁回大石屯，见到许多过去要好的同学。他们同我谈小江长塘山“抗大”式的学习生活，令我羡慕不已。在进步老师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募捐、劳军等活动，思想得到很大提高。

这个时期，由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战争形势的影响，党组织在学校中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初步获得的唯物主义思想认识，使我在得到政治进步的同时，最终冲破了宗教枷锁，得到精神的解放。

1939年11月，日寇攻陷钦、防，形势紧张，学校停课。我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以合浦一中进步同学为主的合浦战地服务团。战服团“抗大”式的生活，满足了我的渴望，使我得以补上了走上革命的先修课。思想上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教育。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思想日益明确、坚定。

1940年夏，日寇从钦、防撤退，学校复课。战服团的同学回到大石屯读书。随着第二次反共逆流的到来，反动训育主任杨超兰加紧在学生中进行反共宣传。党组织发动了反汪、反逆流，打倒汪派分子杨超兰的斗争。这使我又一次受到教育和锻炼，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有进一步的认识。

秋天，我投考廉州中学高中，杨超兰通知廉中不要录取一中参加反杨斗争的同学，

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最后我还是被录取了。可惜上学期还没有读完，我又得了病，只好辍学回家医病。

在北海养病期间，王振煊经常来看我，借进步书报给我看，和我讨论问题，坚定我的革命信念。皖南事变后，反共逆流日益严重，但在他的鼓励下，我下了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当我基本恢复健康，父亲要我去盐务局找事做时，我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拒绝了走投靠他们的路。1942年秋，在王振煊的安排下，我到了灵山县伯劳乡去教书。在伯劳小学我和何正四同事，又受到他的教育和鼓励，坚定了我入党的要求。

1943年秋，经过王振煊的关系，由卢传义介绍我找到在公馆浪坡村教书的叶国良（叶信芳）同志，再由他介绍我到公馆的樟嘉小学去教书。44年的元旦，叶国良同志约我到浪坡去，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填了表。叶国良同志让我春节在家中等候组织派人来联系。春节刚过，叶国良同志和卢传义同志就来到我家找我，宣布上级党组织批准了我入党。

这个学期，组织上通过我的介绍，安排伍朝汉和苏少芳同志同我一道到樟嘉小学教书。

学期开始后，来了个钟××，这个家伙反动透顶，似乎是嗅到了一些什么气味专门跟着我们来的。我们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宣传党的主张，得到学生的拥护，并培养了几个进步学生。钟××就明里暗里攻击我们，我们就团结多数教员孤立他。后来伍朝汉同志同苏少芳和我商量，决定发动学生罢他的课，要把他撵走。由于做法简单，对学生家长的工作也做得不够，引起校长和学生家长对伍朝汉同志的不满，学期结束不再聘请他。党组织也决定我和苏少芳同志都不再回去。

1944年秋，党组织安排我到东成乡排上小学教书，张启泰同志和我在一起。卢传义同志传达上级指示，要在农民中组织秘密游击小组，具体分工由张启泰同志去做。快到寒假的时候，组织通知我们假期不要回家，就在学校等候组织指示。将近旧历年底，组织通知我们到香山同卢传义、王振煊等同志一起到白石水集结，参加武装起义。

春节，起义部队同由廉江过来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在金街会师。部队整编，我被编入政工队任小组长，后又调任连队文化教员，随二支队辗转回到廉江新塘地区，调到政治部出版处，在庞自同志领导下搞油印出版工作，我分工刻写蜡版，当时我们出版的《解放军报》、学习材料和其他小册子等，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和领导的赞扬。

日本投降后，1945年九月，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一团（老一团）奉命突破敌人包围，西进十万大山开辟山区根据地，我和耀南本来都是准备归回合灵大队开回合灵地区的。临行那天晚上，突然通知我俩调到老一团，随团西进，搞油印宣传工作。我们背带筒

单的油印工具、纸张和部份宣传品，立即随队出发。在西进途中，每到一地，我们就向群众散发宣传品，只要时间来得及，放下背包，摆开工具，就刻印新的宣传品。由于我们搞的油印宣传品比较工整、好看，群众很是欣赏，纷纷相传：“这是真共产党，不是土共。”

到了十万大山区，我和耀南被分在靠大免山脚一个叫“天埝”的独家村，设一个联络点。他负责刻印文件、宣传品（我协助他），我负责联络交通。敌人来了，我们就撤到村后一个大山洞里。有时还有一些过路的同志和病员到我们山洞来休息养病。

1946年5、6月间，我们随老一团撤入越南的高平附近休整。次年一月，我一边搞油印工作（我任油印室组长），一边参加干部训练班学习，并任区队长。

二月，我和黄海（刘仲曼）同志被调到高平城里办一个以华侨群众为对象的油印报《公道报》，黄海为主编，我除了刻写油印外，也写一点稿子，并参加编辑。这个报纸，配合越北一带的华侨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办了半年后，上级指示停办，我们又回到高平训练班。我仍然搞油印工作和参加学习。

九月，经过整训的老一团，奉命回国开辟靖（西）镇（边）区，我调任团政治处宣传股长。

十二月，我被调到平孟乡任支部书记，做地方工作。平孟乡支部在边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成立各种群众团体，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等，积极开展反霸斗争，把血债累累的恶霸陈俊廷抓起来斗争后枪毙了。接着根据边委指示，在平孟乡进行土改，搞了一些过左的东西。但这一段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打击了阶级敌人，摧毁了封建势力，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发动和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在人力物力上支援了部队。

1948年5月，根据华南分局指示，部队小股坚持，大股插出，向云南方向靠拢，六月到达滇越边界的河阳。我又回到部队，任政治处组织股长。九月，调任边委组织部干事。

1949年9月，我被任命为滇桂黔边纵四支队新成立的警备团的政委。10月警备团合并于三十二团，我调任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带领一个工作队在邱北县的布洪、布凹和广南县的珠琳乡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做迎接大军进入云南的工作。

1950年2月，迎军工作结束。十月，我被任命为广南县委书记。八月又任文山地委委员。十一月调到云南省委党校工作。先后担任组教科副科长，党委委员，组织处处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1958年5月，在反右补课中，我被打成所谓“郑、王反党集团”的成员和骨干，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下放元江红光农场劳动。1961年10月摘去右派帽子，翌年九月调任元江县百货公司副经理。1966年7月，调任元江县商业局业

务股副股长。1968年“划线站队”开始，在劫难逃，以“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再次被批斗，以后是审查、劳动。1975年5月，被任命为元江县食品公司冷库小组副组长。

1979年4月改正错划右派。5月调回云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党委委员。1982年11月离休。

李耀南（自传）

1923年11月10日，我出生于北海市一个宗教职业者家庭。父亲原籍是钦县龙门港人，因农村家境不佳，随其伯父过海到北海谋生，入德国教会所办的印书馆当排字工人，以后逐步为德国牧师栽培成为传教的先生。当我还在襁褓之中，父母就抱我接受了教会的“洗礼”，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可能不被打上宗教的印记。不必隐讳，在我开始接受进步同学和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教育之前，曾经是自许为虔诚的信徒的。我读书的初小阶段，是在教会所办的书塾里渡过的。后来父亲送我进入区立第三小学校插班四年级就读。在三小，我开始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冯廉先老师教我们唱聂耳的歌曲，教我们学习新文字。我开始知道中国有被誉为东方高尔基的鲁迅先生等等。可惜不久，冯老师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促使我从封闭的家庭禁锢中冲了出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及教育下，逐步由抗日救亡的觉醒进而到民主革命的觉悟，并终于汇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在钦州登陆，进犯桂南，其右翼侵至平良渡，直指合浦县境。国民党当局仓惶逃窜，学校停课。以合浦一中（校址迁在大石屯）进步师生为主体，组织了合浦战地服务团。我和胞兄耀东一同参加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团体，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实际领导的。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进步团体中，我首次参加了集体生活，直接接受进步同学的启发和教育，对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口号，我是赞成和拥护的。我还知道了蒋介石实际上是消极抗日而积极反共的。我尤其憎恨当地的贪官污吏以及奸商运米资敌，所以当团里布置大家到四乡发动群众向县政府请愿反对奸商运米资敌时，我是积极去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在请愿游行时，我的情绪真是达到了义愤填膺的地步，高呼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随着桂南战局渐趋稳定，学校于1940年春复课，战服团正式结束，大家返校上学。同年夏，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原战服团的成员为骨干广泛团结各班同学，展开了反对汪派汉奸杨超兰的斗争。我也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有一次曾随同罗永莹等同学到县城钟鼓楼国民党部找校长周胜皋（国民党县党部部长）进行说理，反

对无理开除谭锡裕、罗永莹等同学。学校为了瓦解学生运动，提前放暑假，但一大批进步同学仍然坚持留在学校，一面学习《大众哲学》等书籍，一面向社会进行宣传，揭发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真像。我参加了一次拂晓前进城散发传单的活动，胜利完成了任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党组织发动反对杨超兰的斗争，是配合全国的反逆流斗争的。县内同时开展斗争的还有白石水和西场等地，白石水地区的斗争还发展成为农民武装斗争。

1940年秋，合浦一中迁校到廉州平田村，我住在沙窝德国楼走读。初中三年级这一年，是我思想上颇为苦闷的一年。校内三青团活动比较厉害，而进步同学几乎都已走光了。我除了参加本校的歌咏队以外，就是自己阅读进步书刊和抄唱抗日歌曲等等。每个星期天，还赶到城内教堂例行做礼拜的机会，先到地处教堂后面的看守所去看望杨衍汉、张启泰等被捕的同学。还不断把我抄到的抗日歌曲及进步歌曲送给他们。

1941年秋，我考上省立廉州中学高中。在整个高中期间，我同挚友黄裕梅一起，通过领导校内歌咏队、办班壁报和开办“书报供应社”等活动，团结大批同学。我们班办的壁报，在校内是数有名气的，曾获得全校壁报比赛的第一名。从我们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被大家推举为歌咏队的队长，到了高中二年级时，我们请由校部指派黄裕梅为队长，我任指挥，直至高中毕业时止，我们都坚持演唱抗战歌曲和进步歌曲。曾在县城举行过音乐会，演唱黄河大合唱。书报供应社更为同学们提供了不少进步读物。所有这些活动，遭到学校训导主任的敌视。他时常找岔子来打击我们。有一次在课堂上黄裕梅就当面顶撞他，他便对校长施加压力要开除黄裕梅，但由于多数老师从中斡旋，校长只给黄裕梅记大过一次作罢。另一次，他硬要把我们已经贴出的壁报开天窗，我们就补上一幅漫画来讽刺他。我们低一年级的同学王献芝是地下党员，我们的活动他当然是支持的，他也是书报供应社的股东。通过他，当时地下县委的领导也曾到学校来同黄裕梅谈过话，我估计是对我们的活动有所布置。此后不久，我们就利用刻印歌谱作为掩护，刻印了一批党的宣传品(小册子)，在进步的同学中传送阅读。

1944年7月王献芝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追求多年的政治愿望终于实现了。暑假过后，我被派往旧州乡元坝小学教书，同邓鼎同志在一起，历时一个学期。

1945年春，我在北海家里渡寒假，卢传义同志来传达党即将组织武装起义的通知，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并特别强调，如不参加武装起义，就作为自动脱党。我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启程奔赴集结地点待命。从此，我就一直在人民革命武装部队里工作，并随部队转战经广西而进入云南。先后任过团政工队长、报纸编辑、干训班指导员、区党委秘书、区党委工作团团长及区党委出版组组长等职。

1950年三月，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建立时，我就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直至一九五八

年五月。先后任过干事，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等职。

1958年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下，云南省委还在省内进行“补课”，于是生拉活扯地把省委组织部的正副部长郑敦和王镜如打成“反党集团”，把省管以上的干部共一百五十余人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或骨干份子。我也被“誉”为“郑敦的亲信”而扣上右派份子帽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只发给一级工人的工资，这才称了某些“左”撇子的心。我被送往元江红光农场劳动三年之后，由省委组织部通知调来昆明学习，摘了帽子，本来说定很快就分配适当的领导职务，但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新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形势下，我又被下放到国营陆良农场，一呆又是十多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竟动用专政工具重新给我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云南高原，所谓的“郑王反党集团”这个全省最大的冤假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我的冤案也随之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使我的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党组织重新给我作出正确的结论，把过去错处的结论全部推倒，给我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工资级别，分配相当原职级的工作职务。

1979年5月，党分配我到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任文教处处长职。以我中断工作二十一年且兼年过半百的情况来说，担任这个职务，真有如俗话说的“六十岁学吹鼓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鉴于四化建设的需要，自从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以后，我就认为应该以实际行动来拥护党的这个战略决策，所以在1983年底，我满六十岁时，就立即向党组织写了离休的报告。经过党组织的安排，已于一九八四年五月批准我离休。但我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为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现在是中共云南省委民族部省民委机关委员会的委员，分工管机关党委的组织工作。在任期内，我要把这件工作做好。

李爱民

李爱民，原名李廷松，曾用名李森，现合浦县福成乡夏佳塘村人，1920年出生在自由职业的家庭，他的父亲李瀛洲，是当地较有名气的中医和私塾先生。少年时代，他在乡间读了八年私塾和一年高小，十四岁起，先后在北海郊区白虎头、高沙龙以及家乡等地当私塾先生和小学教员，达十年之久。后来，他又当过药剂员和盐工。

1943年8月，李爱民参加了革命。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灵南谷埠小学，以校长之职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45年2月，他参加了白石水(大成)武装起义，后调至小江部队第二中队。同年3月，南路二支队在谷埠被敌袭击，洪大队长等近三十人牺牲在武和江中。支队长黄景文指定他留下处理善后工作。他充分利用原有的关系，向群众揭露敌人的罪恶，收容失散人员，并依靠群众埋葬了牺牲的的战友，在十余天里较好

地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取道南康汇合陈符隆、钟喜权（钟古）等同志，东撤高雷地区。老一团组建后，他担任医生工作，“李医官”的别称则由此而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路特委决定主力部队——老一团西进十万出，以保存武装力量，建设十万山根据地。9月李爱民随队西征。当时医药极缺，他一面用草药给治疗伤病员，一面采集镇痛、散淤类的草药，试制止血镇痛散，解决了部队行军作战的一大难题。后来，他随部队转战于中越边境。48年7月，老一团奉命回国开辟滇桂黔边区根据地，他任边纵卫生处副处长，坚持战斗到解放。

解放初，他从昆明调返广西，担任钦州军分区卫生处副处长，52年转业到广西省高等法院负责秘书工作，后调北海，任市公安局侦察科长、高德区委书记。从53年冬至58年夏，他还曾任广西省中医院院长、合浦专署文教卫生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他为发展中医学以及组建北海市医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贡献。58年6月，他进广东省委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省公安总队后勤部卫生科长，这是他第二次当“兵”。64年10月他再次从部队转业到广东省卫生厅工作。

在解放后的三十多年中，李爱民多次变动工作，既当官又为民，能上能下，是一位好同志。可是，据了解，有关单位至今还不给他落实有关老干部政策，实在令人遗憾。

李 廉 东

李廉东，祖籍广东新会，1920年7月出生子合浦县廉州镇一个“小康”之家。他原名李辛农，乳名亚勤，曾用

名沙克，曾在廉州德华小学、廉州中学读书。中学时代，他参加了廉中进步学生团体“艺宫学术研究会”，开展阅读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38年2月，李廉东在抗日进步力量推动下，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到延安后，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于五月间参加共产党，11月学习结束后，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重任，到香港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39年底，他奉调至广东惠东宝新编游击大队（东纵前身），此后他一直在东纵工作和战斗了五年余，先后担任干训班指导员、文化教员、新百姓报社社长、前进报社副社长、东纵二支队宣传股长等职，随部队转战在潼湖之畔和西枝江两岸的惠阳、惠东和宝安等地。

45年2月，李廉东重返南路地区工作，曾任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南路人民解放军老一团政治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重兵压向南路，在劫收胜利成果的同时，妄图扼杀我武装力量。南路特委决定老一团西进十万山建设根据地，他随团挥戈西进，于十月间到达十万山，在中越边坚持了两年多的艰苦奋斗。

48年初，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为了加强对合灵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李廉东奉调回合浦，任粤桂边人民解放军新六团政委。当时，合、灵反动武装重点扫荡我武利汪两岸广大地区。在合、灵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新六团依靠群众的配合，采取小部坚持，主力转移，避实击虚等战术，粉碎了敌人的重点扫荡，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次年一月，李廉东调任粤桂边纵干训团政委，在廉遂边分批举办干部训练班，为迎接全边区的解放和接管城市，培养了大批干部。49年6月李廉东任粤桂边纵主力第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六支队肩负边区党委关于打通高雷至六万山、十万山走廊，把整个南路地区联成一片的战略任务，挥戈西进。李廉东等率领先遣小组先期出发，分别与六万山地委、十万山地委取得联系，动员群众筹备粮食，搜集情报，搞好交通。第六、四、三支队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边区党委赋予的任务。九月底，六支队奉命东撤，配合南下大军作战，策动驻西营的六十三军一部起义，解放了湛江。

全国大陆解放后，李廉东先后担任高雷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南军区独立22团政委，粤西军区干部科科长、组织科长、政工科长，广东军区政治部组织处处长，阳江县人武部政委，肇庆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卫生厅医政局局长、药政局局长，广东省红工矿务局副局长、副书记，广东省工交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

吕剑屏

吕剑屏，原名吕敬芬，曾用名方明，广西北海人，1920年7月13日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一直在部队里工作，1981年秋才正式离休，住湖北省军区黄石干休所。

吕剑屏出身于小商之家，父母生下他兄弟姐妹九人，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一般。他父亲于30年去世后，原来经营的生意萧条，家境日趋贫困。他八岁入北海第三初小读书，十二岁考上香坪小学读高小，十四岁考进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前身)，20岁时在一中高中毕业。

合浦一中是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吕剑屏就读于一中期间，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许涤新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徐懋庸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毛泽东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新阶段》、《论持久战》，以及经常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永生》等杂志，因此，思想倾向于进步，热情参加了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37年1月，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在北海，廉州和常乐逮捕了一批学生和青年，妄图把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吕剑屏是被捕者之一，反动当局审问、追查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假枪毙的手段相威胁，却始终得不出任何证据，最后只好把他们释放了。吕剑屏还积极参加了反对思想反动的叶天一接长一中，反对一中教导主任杨超兰压制学生开展救亡活动等学潮，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吕剑屏于1940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在常乐、石头埠和化州县良光等地当小学教师。他在良光任教时，曾大力支持党组织工作，并根据党组织的布置，积极组织抗日游击小组，秘密筹集武器。

1944年秋，中共南路特委决定南路全面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抗日。12月，吕剑屏参加武装起义，任中队指导员。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后，他任四团一连指导员，带领队伍在化南一带打击敌人，开辟游击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三个师进逼南路，在抢先劫收胜利果实的同时，妄图歼灭我南路人民武装。四团从廉、遂开返化、吴，分散活动，坚持斗争，他和同志们一起经过艰苦努力，恢复和扩大了游击区，保存了革命力量。47年初，化、吴部队整编，他调任新四团政治处主任，后又任政委。49年夏天，粤桂边纵队的主力——第六支队组建，他任六支队十七团团长兼政委。

49年4月我百万大军渡江战役后，全国胜利形势迅猛发展，南下大军直指两广地区。粤桂边区党委和边纵命令六支队西进钦廉四属，打通高雷地区至六万山、十万山地区的走廊，以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两广。六支队的十六团、十七团于七月初挥师西进，首战瓦窑岭反动据点，战斗打响后，合浦县伪自卫总队副林镜秋率第二营纠集公馆、白沙自卫队及博白县驻龙潭自卫队共四五百人，赶往增援。吕剑屏指挥全团会同四支队新六团（后为十团）某连，在坪鸭营一带阻击援敌，毙俘敌数十人，缴获轻机一挺、长短枪数十支。接着，六支队向合浦属的旧州江口进军，同时分别攻击驻江口的伪第二自卫大队一个中队和旧州乡公所。吕剑屏所在的十七团在四支新六团五连配合下，于瓦子岭、新圩（泉水）一线阻击石埭、张黄方向的援敌，击溃从张黄来增援的合浦县第一自卫大队约二百人的进攻，毙敌大队长丁意中等二十多人，使十六团顺利攻击旧州乡公所据点当铺，生俘伪乡长吴显臣，缴获机枪一挺和其他武器一批，并开仓分粮三万多斤给群众。六支队稍事休整后横渡武利江，向灵南伯劳圩进军。经过我党长期工作影响下的伯劳中学进步师生、群众数百人，在进步校长李雪涯等人带领下，携机枪十余挺起义。六支队帮助组建了合灵南武装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三百多人、枪。七月下旬，吕剑屏根据前委指示，指挥十七团（会同四支十二团七连）拔除了灵钦边的反动据点冷水塘，活捉反动乡长利锦玉。此后，六支队进入钦北，同三支队并肩战斗，连克敌据点数处。至九月底，六支队顺利完成了打通高雷地区至六万山、十万山的走廊，把根据地联成一片的任务，吕剑屏率十七团同十六团一起回师廉江，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全边区。

解放初，吕剑屏曾在南路军分区、高雷军分区、粤西军区等单位政治部任宣传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并到中南区理论学习班受训后调第八步兵预备学校任中级理论教员兼政教室主任、政治系主任、宣传科长。从58年起，吕剑屏还先后任武汉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秘书科长、秘书处长、鸡公山疗养院政委、489军械仓库政委等职。他为部队

的正规化、革命化建设贡献了力量。

伍朝汉（自述）

【编者按】伍朝汉一生坎坷，受尽挫折，但仍坚贞不拔为党工作，这里我们不想多说，让他自己说吧。

我于1921年出生在北海市一个手工业劳动者的家庭，父母亲都不识字，我有五个兄弟，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自小在北海读书，1934年十三岁时，进入合浦一中，在读初中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读了些社会科学书籍。那时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浪潮，我与一些进步同学经常谈论抗日的形势。1936年北海发生了“九三”事件，我参加了北海的学生游行队伍，那时认识了赵世尧。我们把日本仔和国民党的两个代表从警察所一直赶到海关门口，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把他们赶下艇去，觉得痛快极了。

自此以后，在要求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学校里大量组织了进步的读书会，我和一些同学也起来组织读书会。我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这样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7年1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和十多个同学被国民党逮捕了，关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部里。

国民党逮捕我们，就是想追查共产党，我们每个人都被审讯过，但他们毫无所获，结果把我们关了十多天便释放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坐监的滋味。

抗战开始时，我正开始读高中，由于全面抗战，全国兴起抗日高潮，我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同大家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去。那时读马列主义著作成为一种进步趋向，对共产党的理解吸引了我，我向赵世尧借得一本《西行漫记》，读后觉得非常向往。1938年，我们读书很不安定，去恩平集训团解散回来，又参加了战地服务队，接着进行拒绝叶天一接长合浦一中活动，后随校到了小江长塘山，在那里大搞抗先队的工作，1939年春回到大石屯读高二班。因为搞抗日先锋队工作，被认为思想赤化，是年暑假，被学校着令退学。无奈，只好转到廉中去继续读书。这一期间，有几件事给我深刻的教育，冬季，由地下党组织我和几个同学去灵山石塘监狱探望了陈任生老师等人（合浦一次党案被捕），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人遭国民党监禁的。我们当时并不害怕，说是学生探望老师，带了食品和衣服去慰问他们，我站在监狱门口看到陈老师等人，心情觉得又难过又激动。1940年的上半年，参加了对八路军传单的讨论，同学们推举我做讨论会的主席，这次讨论扩大了传单的影响；还有一件是参加了小江的米案斗争，反对奸商勾结贪官污吏运米资敌。些事情，包含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从实践中使我的认识进了一步。

1940年7月，我毕业回到北海，由伍雍谊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就在我

家里举行入党仪式，监誓人是卢传义同志。入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使我感到自豪。

入党后，即被派往当时在钦州小董抗日前线的“南九”游击队的政工队工作，参加了中共钦州特别支部。支书是庞自同志。1941年春由于活动暴露，奉命同庞自转移到防城做开辟工作。1943年调回合浦，我开始认识杨甫同志。

1944年夏季，我被调到地下党机关永信烟庄做“掌柜”，以烟庄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后因烟庄被特务破坏而被捕。在合浦监狱关了三个多月，被多次审讯，敌人一无所获，于同年十二月间，日寇逼近合浦，国民党仓惶逃走，我与邓荣存同志等逃出监狱。这是我的第二次被捕。

出狱后，很快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合浦的南康起义和西场起义，起义后在西场游击队里任文化教员，随队伍转移到遂溪。日寇投降后部队又回到合浦，在西场一带活动，后因作战受挫，队伍被打散、失去联系，被迫与一些同志转移到越南。

在越南，与从南路撤退过来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秋，被派到海防华侨中学教书，做学生工作，1947年夏，被法帝国主义统治者逮捕，以电刑迫我招认是共产党，但结果他们是一无所获，后被驱逐出境，移交广西国民党政府，由于查无实据，遂于1948年4月在广西龙州释放。这是我的第三次被捕，这次我是亲身体会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互相勾结镇压革命。

释放后，即与同案的同志往香港找到了党组织，于1948年7月被派回合浦工作。

解放以后，在北海军政委员会担任文教科兼管支前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大军解放涠洲岛和海南岛。1951年起开始参加土改运动，直至52年冬复查结束。土改后调到钦州县，一直搞农村工作。1958年7月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严重的处分，1962年摘除帽子分配工作。“文革”中又受到迫害，被诬为“特务”，从1968年冬起立案审查，到农场劳动长达五年之久。1979年3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改正错划右派。

右派问题平反后，我继续奋发工作，先在钦州县水产局、人大常委、党史办任职，1982年春调地委党史办，1984年调到处理地下党遗留办。不论调到那个部门，我是竭尽所能为党工作。

今天回顾过去，感慨很多，解放前受过敌人多次逮捕摧残，解放后又为极左路线长期迫害，但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始终在共产主义道路上前进。

朱 光（自传）

朱光，原名朱有喜，1927年10月23日（农历）出生于合浦县公馆镇香山井滕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早年病故，母亲抚养我们。家里很贫穷，只靠租地主田和一些祖上

蒸尝田种耕维持生活。由于父亲早逝家里贫穷，我从小参加家里劳动，读小学都是停停读读的。得到亲友和老师的热心关照勉强读到小学毕业。但真是穷人有志气，当小学毕业后，全班毕业同学考中学，就只有我一人考上合浦县公馆五中。本无能力读中学的，但得到祖上蒸尝补助些谷，勉强上了中学，但只读了三个多月。1944年秋，日寇撤退路过合浦，国民党不战溃退，学校解散，我们便回家了。当年19月21日（农历）便参加合浦人民武装起义了。学生时代从此结束了，战士生活开始了。我当时才17岁。我母亲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除了勤耕会织疼爱子女外，她很关心体贴别人。她从小学会祖传的药方艾火。村上男女老少特别幼儿发病都找她帮治（用艾火烧），都治好一些人，所以乡亲们对她很好，都热情称呼她好八婶。我们兄弟参加革命后，她出于对子女疼爱而担心，但她一贯支持革命，每当革命同志（包括起义前许多革命老师进步青年）到来时，她都热情招呼食饭和放哨。1962年病故。我读小学二年级时，邹贞业（秀才）同志到我学校当校长，大学生到偏僻农村教书是破天荒的事，名声很大，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当时我虽童年，但记忆犹新的。他在我村学校时间很短（国民党追捕他而仓促离开），但已播下革命种子。随后革命老师，进步青年不断到我学校来任教。特别对我影响最深，教育最大的是岑月英（当时叫岑冠华）、梁国珍（当时叫梁毅克）、王朝明（当时叫王子秋）等老师，是他（她）们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所以他（她）们是我的革命老前辈，亦是我的恩师，我永远崇敬他（她）们。另外，我哥哥朱光炎、朱伟对我直接的革命教育和影响，对我教育也很大的。就在哥哥的革命影响，革命老师的精心培育，我就在1944年9月23日（当时才17岁）在王朝明同志介绍，卢传义同志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随着1944年12月21日（农历）参加合浦人民武装起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当年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斗志旺盛，工作积极，作战也较勇敢。大小战斗参加数十次，在当年的游击战斗中，本地区较大的武利江边的歼灭战，榕木角的突围战，解放后剿匪战斗的北通南蛇攻坚战，在上级的果断指挥，同志们的英勇战斗，任务完成较好。在战争年代，同志们对我信任，组织上对我大胆使用，先后担任班政治战士，排政治服务员，连政治指导员，在22岁时组织上就让我担任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独立营教导员，营党委书记，支队党委委员。后调到第七支队仍担任上述职务。解放初期，独立营奉命到浦北灵山剿匪，经过紧张的战斗，股匪基本歼灭，我营转入驻剿，从而兼任灵山县武利区区委书记，较好的完成了驻剿任务。剿匪结束后，调任钦廉军分区教导大队教导员、党委书记。1954年后一直担任县兵役局长（党委书记），县武装部长（党委书记），历届分区党委委员，历届县委常委。直至1979年11月转业到广西区侨办，先后负责政治处、党组纪检组工作。

由于长期坚持在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所以在1975年9月5日后陆续在解放

军报、战士报、广西日报、广播电台，以“踏遍青山人未老”为题的内容介绍过我的事迹。同时解放后在部队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出席广东湛江军分区、广西钦州军分区、柳州军分区、广东军区、广西军区、广州军区等各级先进个人、单位代表会，受到多次表扬和奖励。

解放后，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本人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特别在“文革”中揪“南路党”全面审查广西地下党时，本人遭到原广西军区钦州分区的政治迫害。在“文革”开始先诬蔑我是地主出身成份（已平反纠正）。随后，我哥哥朱光炎（早在1939年入党）在“文革”中，于浦北县被迫害致死（现已平反昭雪）。朱伟于“文革”中在钦州地区被迫害长达十年之久（现已彻底平反）。我受到株连，给我强加了政治上不可靠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一贬再贬，向广西军区提出了申诉。

刘业钦

刘业钦，又名刘业鑫，灵山县人，1925年7月生于灵山县平山乡灵家村，家有十亩地，干革命时卖光押光。

1945年以前，先后在灵家小学和平山灵中读书，受到地下党员刘益基、陈铭金、张书坚教育影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1945年2月，参加灵山武装起义，当抗日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1946年5月，曾及时准确送情报给游击队，伏击敌保安司令部军需处长，歼灭一批敌人。1947年2月，担任游击队排长、副队长，这一年十一月，由温之淮、陈桂声介绍，陈铭金接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6月至49年11月，在合灵区委工作，任组织干事、区委。

灵山解放后，转到公安战线，曾代理公安局长；1952年1月，调钦州地区公安处，任代执行科长，1952年8月，调合浦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参加县委，1955年3月，调合浦专署公安处，任政保科长，党组成员；1959年1月，调湛江地区公安处，任保卫科长；1959年9月，调东兴县公安局，任局长及政法党组书记，县委常委。在“文革”前，先后到中南局党校、中央公安学院学习。粉碎“四人帮”以后，调钦州地区公安处任边防科长，1978年8月，任公安处副处长，参加县委常委；1983年7月，任中共钦州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现已退居二线，任地委组织部顾问。

这位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同志，也免不了“左”的茶毒。1958年在所谓反地方主义中，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在十年浩劫中，被加上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被残酷批斗迫害6个年头。这些都已平反了，但身心受到摧残，生命被浪费，这是没法平的了。

苏少琳

苏少琳是合浦县人，1922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父亲是个宗教职业者。她从小失去母亲，跟着二伯过着凄苦的生活，读书以后，还得在佛前念佛经，学业成绩虽好，却是个只知埋头读书的书呆子。

1935年从湛江迁回北海，考入合浦一中读初中，看了一些革命文艺书，受到进步影响，和堂姐少芳在一起，开始剪辫子，反抗封建迷信压迫，以后参加何醒予的静励斋读书活动，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她父亲千方百计逼她离开北海，她坚决抵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运动，这对她一生影响是很大的。

1938年暑期，她要往广州集训，因交通中断，接着广州失陷，被逼留在香港读完高中。毕业后无事可做，回到湛江家里，家已破产，加上父亲哥哥病故，生活负担很重，家里的继母想她嫁给国民党官吏做姨太太，维持这个破败家庭。她坚决反抗，走出家庭，到吴川县教小学。在这里见到李梓明、蔡秀英夫妇，鼓励她走革命道路。堂姐苏少芳也在这里，满腔热情帮助她，帮她找职业。1942年秋，介绍她到党领导的晨光小学当教员。和地下党员许乃超、陈健、廖晃欣、梁慧明一起，在他们帮助下，认真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

1943年日寇在西营登陆，环境十分艰苦险恶，一些地下党员撤退了。这时，她参加了抗日秘密工作，抄写传单，跑交通，带文件，他还协助陈健同志，在晨光中学办起初中班，让更多的子弟能上中学。陈健同志撤退后，她仍然坚持这个革命岗位。

1945年，经杜兰介绍，余明炎接收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时，日寇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到处劫收，在余明炎领导下，她和老师们开展护校斗争，拒绝国民党接收，护校斗争胜利了。以后，少琳多次参加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因为太“红”了，便调到当时在越南高平的广东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一团工作。

在部队干部训练班学习后，两次被派到越南北方搞华侨工作，后随军进入广西，在《靖镇报》工作。48年以后，为了培养干部开辟边区工作，组织让她搞干部培训工作。解放前夕，调滇桂黔边纵队四支队政治部，任群运科科长。

50年3月，她被调到广南县委任组织部长，4月初，她带一个工作团下乡征粮，她和基干大队十二人一起，被叛乱的土匪包围。苏少琳没有打过仗，不能掌握队伍、指挥战斗，那个基于大队长被土匪威协诱降下，跳出围墙投降，其他人也跟着缴枪，最后，她也被冲进来土匪俘去，幸得县府和武装部队及时围剿，土匪被迫将她和50多个工作人员释放。这事，少琳是有缺点错误的，临阵惊恐失措，放弃领导，未能掌握队伍，坚决抵抗，但主要是没有斗争经验，不懂军事所致。在极左思想影响，负责处理她的人，主观武断，硬说她叛变投敌，指使大队长出降，自己也跟着出降，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

但她没有气馁，仍然积极工作。1955年，被提为云南省妇联农村部副部长。可是事情没有完结，57年反右斗争中，她又一次被划为右派，受到降级处分，下放劳动。在十年浩劫中，她又一次作为“叛徒”被揪斗。几次打击，她没有爬起来，仍积极努力为党工作，为卫护党的利益向坏人坏事斗争，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仍然为党工作。

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少琳在党的关怀下，予以落实政策，调到省党校工作。1984年，对她1950年征粮中所犯错误，文山自治州作了复查，恢复了她的党籍，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苏少琳已经离休了，但还决心在有生之年，为革命发挥余热，像她三位姐姐（少婉、少芝、少芳）一样，做党的好儿女。

（根据本人自传改写）

杨 甫

杨甫，是我们合浦地下党中资历最长、年纪最大的一位。他的原名叫吴世栋，曾用名胡宏盛、杨昌龄、刘德才，代号“三叔”。

1908年10月14日，杨甫生于广东省海南岛琼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26年在琼东县立中学读初中时，曾参加大革命运动，次年八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杨甫是1940年到南路工作的。那时候，中共广东省南路特委刚成立，杨甫任特委常委、宣传部长。鉴于日寇已占领了钦邕线的广大地区，钦廉四属和桂南一带成了敌占区和前线，广东省委决定成立粤桂边区工委，开辟粤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工委由周楠任书记，杨甫任组织部长，余明炎任宣传部长。杨甫和余明炎于40年冬先期到达合浦。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日寇从钦邕线撤退，广东省委决定撤销粤桂边区工委，余明炎调走，杨甫则留在合浦，以南路特委常委的身份，领导钦廉四属党的工作。

杨甫积极领导了白石水抗日自卫武装斗争。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随着全国反共逆流的高涨，合浦县当局又蓄谋对白石水游击根据地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而对这种严重形势，杨甫和合浦中心县委决定采取如下对策：一、用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武装部队的名义，发表《敬告合浦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重申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原则立场；阐明白石水人民抗日自卫斗争的实质，并表明人民自卫武装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这份传单在钦廉四属地区乃至南路大量印发，广为宣传，在政治上影响很大。二、通过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秘密捐献枪支、弹药、现款和衣服、药品，帮助自卫武装队伍解决困难。三、充实骨干力量，加强对自卫武装斗争的领导。四、发动常备武装中队抓紧战斗间隙，开展生产自救，坚持艰苦奋斗。同年2月上旬，伪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率领千余兵力，对白石水进行第

三次“围剿”。敌人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手段，大放和谈烟幕，妄图诱降。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白石水自卫武装队伍一面严阵以待，一面应约由张世聪同陈国勋针锋相对地谈判，揭穿其和谈阴谋，迫敌不敢妄动，再加上日寇在北海登陆，陈国勋慌忙撤兵，第三次“围剿”破产了。

后来，广东省委下令把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杨甫虽有不同见解，但还是从纯朴的感情出发，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他从特委听了传达即赶回合浦，召集中心县委成员在白沙宏德小学开会，传达贯彻。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布置：部队的武器，埋藏封存；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要安全转移；对地方的党员、群众要做好说服工作，并准备应付敌人的再次进攻等。会后不久，部队解散了，直接领导这场斗争的张世聪、陆新、朱兰清、卢文等相继调离。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又四个月的威武雄壮的白石水武装斗争，在上级的指令下主动撤销了。

白石水武装斗争停止后，杨甫领导四属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艰苦地培养和积蓄力量。杨甫还亲自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42年7月，杨甫在白沙宏德小学举办各区委领导参加的整风学习班，学习党中央的整顿“三风”文件。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风运动。学习班结束后，各区委、支部普遍开展整风学习，使全体党员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战斗力。

44年夏天，杨甫为了以社会职业掩护地下斗争，以及便于同各地党组织联系，在廉州开设了永信烟庄，它对内是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杨甫化名刘德才任烟庄老板，安排党员伍朝汉等分别任经理和店员。烟庄开业后，以专营烟丝之便，经常同合、灵、钦、防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或交通员联系，传递情况和书刊，部署工作，对四属党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年9月22日，永信烟庄被敌人破坏，伍朝汉等三位党员被捕，杨甫在地下党员余富茵和陈耀琪的掩护下，逃脱敌人的搜捕，安全转移。历史上称此为“永信烟庄事件”。事件发生后，南路特委停止四属党组织生活，对杨甫和四属党组织进行审查，后来作出结论：烟庄事件是杨甫政治思想麻痹，敌特破坏造成，不是内奸叛徒出卖。永信烟庄事件的发生，给四属党的工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45年10月，南路特委决定老一团西进十万山，以保存骨干力量，发展和扩大十万山游击根据地。杨甫任老一团政治督导员。老一团在西进途中，杨甫联系各地党组织选定了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又容易提供给养的进军路线，合、灵、钦各地党组织又发动沿途群众热情筹备粮、革，提供情报和向导，各地武装队伍还积极配合，牵制敌人，保证老一团顺利到达十万山。老一团的西进，使处在困难时期的合、灵、钦部队

和人民群众，深受鼓舞，增强了斗争胜利的信心。

杨甫在领导合浦以至四属地下党的五年间，付出了艰辛，成绩显著，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屡遭磨难，曾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受苦；解放后在政治上又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之流，抓住永信烟庄事件，疯狂地对杨甫进行迫害，妄想以此为突破口，把四属地区乃至南路的党组织打成“特务党”、“叛徒党”，进而把矛头指向当年曾直接领导过南路特委的南方局主要领导人——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但杨甫这位老红军战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正确地看待这一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进入古稀之年仍抱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问，为史学工作贡献余热。近几年来，他又十分关心党史工作，不仅以热忱和求实的精神，多方提供史料，而且谆谆告诫党史工作人员：要多宣传党和人民群众，少宣传个人。对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他总是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此种精神极为可贵，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张 恒

张恒，原名张达珩，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现年69岁，已离休，原任天津市新蕾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她是我们合浦，北海籍的同志中参加革命较早的一位大姐。

张恒于1916年出生在商人之家，祖父张文海是北海张茂和日用杂货铺的老板，父亲张显甫在广州、香港等地经商。因为父亲是个基督教徒，她们姐妹从小就在教会学堂——贞德女校住校读书。她的母亲是个继室，在家里毫无地位。教会学校生活的实践，以及母亲常常被虐待的现实，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布下了教会和封建家庭的阴影，萌发了她的感情上的恨，也初步形成了她后来反对封建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朦胧意识。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发生，随后国民革命军第十师进驻合浦、北海，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浪潮。年仅九岁的张恒热情参加了华文、贞德等校的罢课斗争和示威游行，要求驱逐英籍传教士“董姑娘”出境，迫使英国领事馆答应了这一合理要求。1926年夏天，中共北海党小组诞生了，由江刺横任小组长。这时，张恒的大姐张达超、哥哥张达枢都是群众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俩同江刺横等同志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张恒也经常接近江刺横等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打倒列强》、《国际歌》、《少年先锋队》等革命歌曲，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她们姐妹三人和罗道诚等，成为北海街上最早剪掉辫子和参加妇女解放活动的人。

1926年下半年，张恒同她的三姐张达经，四姐张达璐一起随哥哥前往广州，姐妹

三人投奔了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的义姐沈卓青。当时，该协会在区梦觉领导下，正大力举办平民夜校。张恒她们姐妹就到平民夜校学唱歌曲，听演讲，从中汲取教益。在广州期间，她在亲友的带领下，第一次见到了正在那里主办农民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目睹了广州起义的轰轰烈烈的情景，以及国民党血腥镇压广州起义的罪行，她渴求光明的情感日益强烈。她上初中后，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读了蒋光慈、丁玲、高尔基等的许多进步书刊，热情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1932年，在何干之、温盛刚等人的倡导下，《广州左翼文化大同盟》宣告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她加入了“文总”下的《左联》、《剧联》，参加了演剧、办刊物的活动。她初中毕业后考上广州勤勤师院附中，因父亲破产无法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而辍学。时值白色恐怖笼罩羊城，“文总”活动困难。她和她四姐蒙亲友赞助路费取道福建到上海，广州女师的一些同学和何干之、袁文殊等一批广州“文总”的同志也相继抵达，他们分别参加了“社联”、“剧联”、“左联”，她和一部分女同学在“社联”搞印刷、发行、交通等工作。从此她中断了同家庭的联系。1934年，她经何干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过“社联”党团的印刷，“文委”的交通。在紧张、危险的地下工作的同时，她读了不少鲁迅著作和其他左翼文艺书刊，也读了一些文艺基础理论。次年，亲友劝她留学日本或到广州上“音专”，并负责供给费用。但她一经决定了自己应走的路，再也不想回头了，因而婉然谢绝了亲友的诚意，坚持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先后到女工夜校、海工团任教，一面教女工、海员、农民学文化，一面宣传抗日救亡。期间，她有机会认识了吕骥、孟波、麦新等进步音乐工作者，经过他们的介绍，她和她四姐都参加了上海业余合唱团、歌曲研究会，从事救亡音乐活动，并开始了文艺创作的生涯。

抗战爆发后，她按照文化界党组织的决定，由郭沫若介绍参加了第十五集团军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开展抗战救亡宣传活动。38年春，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陈诚，下令将武汉地区的抗战救亡团体解散，集中到珞珈山受训。她气愤地离开了服务团，并经八路军办事处同意，赴延安学习。她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曾担任过鲁艺音乐系助理员、戏音系指导员，以后又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室音乐组任研究员、中央管弦乐团合唱团成员。48年9月，济南市解放后，她任市委机要秘书，并在工厂委员会工作。

全国大陆解放后，她奉调至天津市工作，初在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任编审，后调市文联音协天津分会编《大众歌选》。她在文联期间，在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写过不少少年儿童歌曲、歌词、剧本和有关音乐问题的文章。52年，她调市文化局工作，从55年起她先后任天津通俗出版社（即天津人民出版社前身）、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党组书记，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为祖国的出版事业和社会

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几年来，年近古稀的张恒还频频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她是天津市作协、音协会员、中国音协会员、天津市音协常务理事和市文联委员。

张恒已于83年年底离休。虽然她离开了出版工作岗位，但仍以战斗不息的精神，继续致力于音乐研究工作。她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决心在垂暮之年谱写出更多更好的少年儿童歌曲，为新一代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根据本人自传)

张 达 明

【编者按】原柳州市委副书记张达明同志，是博白县龙潭人。他在合浦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是张进煊、庞达、李英敏等的学生，受张九匡、张书坚、张义生影响很深，可以说，他的革命是从合浦起步的，虽然他在博白入党，但是他在革命活动中经常来往他的第二故乡合浦，他很谦虚，我们仍然把他作为珠乡战士，现将他的来信并附诗两首发表，向读者介绍这位老战士。

英敏同志：

来信收悉。我十分感谢合浦同志邀请我参加两县一市这次召开的合浦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盛会。因为我从小学到中学，就是在宏德寺三小和公馆五中受教的。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后，也是经常接触合浦方面的同志如张书坚、张义生和白沙的其他许多同志，接受了他们的启发教育和影响，逐步认识革命的道理，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从此起步，我于1941年在博白龙潭中心校教书时，参加了博白的党组织。之后，在地下秘密活动和武装起义斗争时期，我一直都是在博白南部和中、西部活动，又是经常同合浦的同志联系，有时还到合浦境内周旋。因此，对合浦的地方和合浦的同志，具有特别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次有机会回到合浦，得见到许多离别了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同学、老熟人，重诉旧情，真是万分高兴，高兴万分！深为抱歉，由于我不是合浦的党员，不可能编入《珠乡人物志》，只有谢谢你的关心和好意！我没有学过古诗词，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格律声韵，但不管好歹，试学写几句，以叙往事及表达今日的心情。更确切是向老师缴交作业，请老师加以批改教导，想从中获得继续学习的兴趣和入门之路，增加今后生活的一项新内容，以娱晚年。请你在繁忙中不吝指教，专候教育！

此致

敬礼！

张达明 85、3、15

(附诗三首)

西江月

生于龙潭虎岭，^①
启蒙受教珠乡；
青春驰骋粤桂疆，
投效人民解放。

辗转博容王府，^②
群情山水难忘；
劫余发配金城江，^③
柳市幽居迷惘。^④

注：①原籍是博白县龙潭区虎岭乡。②解放后直至1973年，我长期工作调动于博白县、容县和玉林地委。③1974年调河池地委工作。④1978年调柳州市委，1983年冬离休，现住柳州。

合浦抗日武装起义纪念

还珠浩气贯长虹，
波涌南流拍太空；
抗日惩顽除暴政，
南疆千古遗雄风。

老友重逢

三十年代少同窗，
半纪奔波志道同；
岁月风云流水逝，
迎来白发笑春风。

沈汉英

沈汉英，是合浦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广东省湛江市郊区人，1916年12月出生，曾在雷城遂二小学、省立十中、省立江村师范读书。

沈汉英经黄其江介绍，于38年9月入党后曾任吴梅特别支部宣委、遂溪县介炮区、洋青区区委书记、遂溪县特派员、雷州地区特派员、遂溪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战斗年代，沈汉英在合浦地区工作过两个时期。

1948年秋，粤桂边区党委根据当时斗争之需，决定撤销钦廉四属工委，分设粤桂南工委和十万山工委。粤桂南工委书记黄其江，副书记沈汉英、陈华。与此同时，黄、沈还率领邹贞业等三十余名干部来合浦，促进了合浦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是年底，沈

汉英调返边区党委工作。

49年秋天，沈汉英第二次来合浦工作。时已我百万雄师继渡过长江之后，解放了华东、华南的许多重要城市，正挥戈直捣广东，全华南的解放在即。粤桂边区党委部署边纵主力六支队会同钦廉四属地区的四、三支队，打通高雷地区至六万山、十万山地区的走廊。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协调各方军事行动，成立了前委（即前线指挥委员会），由沈汉英为前委书记，三、四、六支队军政领导为成员。他遵照边区党委的部署，派出先遣小组分头同六万山、十万山地委取得联系，六支队随后西进。从七月上旬起，六支队在四支队配合下，接连攻克瓦窑岭、旧州等反动据点，重创敌人地方反动武装，并开仓济贫，进军伯劳，策应伯劳起义，帮助组建了三百多人的灵南武装大队。与此同时，四支十团攻克了钦东重要据点那丽镇，全歼敌人一个保警营，给六支队西进以有力的支援。随后，四、六支队在灵西陆屋会师，沈汉英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前段情况，部署了进一步的战斗行动。会后，四、六支队联合行动，取得了攻克冷水塘据点和奔袭合浦西南重镇西场镇的重大胜利。接着，六支队又连续攻陷敌保二团据点，解放了小董镇，占领钦邕公路要道，并同三支队胜利会师。沈汉英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扫除钦东、灵西南和合浦西北一带反动据点，建立和扩大以小董为中心的钦合灵边根据地，扼守钦邕公路，切断两广敌人的联系，迎接南下大军。三个支队广大指战员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战斗，完成了前委部署的任务。至九月底，三个支队共进行了二十余次较大的战斗，拔除了敌人近二十个据点，解放了十多个圩镇，共歼敌一千余人，完成了打通走廊的战略任务。九月底，南下大军进入广东省境，直逼广州，沈汉英奉命率六支回师廉江，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全边区。

解放后，沈汉英于50年3月调来合浦，任钦廉地委委员兼合浦县委书记。时逢匪祸四起，沈汉英领导合浦军民平定了匪乱，为保卫和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出了大力。

51年8月，沈汉英调离合浦，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曾任重工业部检查员，第一机械工业部人事科长，武汉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广东省委工业部处长，湛江港党委书记，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党委书记，交通部广州航道局副局长等职。他已于84年离休。

陈 廷

陈廷，曾用名陈铭雄，绰号陈皮，合浦县白沙乡宏德两甲水村人，1923年5月14日出生，六岁读私塾，后入六区三小（宏德小学）读小学、合浦五中（公馆中学前身）读初中。

他读初中的时候，在石端、张进煊、何世权和张九匡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教育下，喜读进步书刊，思想上追求进步，曾一度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七、七”事变后，全国

御侮救亡风起云涌，他也初中毕业了，在张进煊的教育下，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是年冬天寒假期间，在广州勳勤大学附中读书的“中青”成员陈铭龙回乡，秘密组织“青年自学社”，陈廷、陈铭金和陈铭楷等十余人积极参加，他们秘密读进步书刊，讨论政治时事；编壁报、画漫画，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38年秋，陈廷参加了合浦县抗日先锋队东三团独立支队工作，同梁国珍等同志先后在梅录洞、崩岭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办民众夜校，传播革命道理，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培养了一批骨干，他也在这一活动中受到了锻炼，于39年5月经陈铭金介绍、邹贞业吸收入党。后来，他又发展了钟高球、刘守仁、刘炳如和钟建辉等人入党，建立起党支部，他任书记。40年冬，公馆、白沙区委调整，阮明任书记，徐汝竑任宣委，他任组委。当时，他的公开职业是在白沙宏德小学任教。该校地处两省三县交界，水陆路交通方便，兼之校内教职员均是地下党员，中心县委机关就设在学校。中心县委的许多重要会议、党训班都在那里召开，往返南路特委的许多同志也在那里中转，陈廷他们把任教所得的钱、粮全部交给党组织作经费。后来，他们还自筹耕牛、农具，利用早晚空余时间，在学校附近开荒十多亩，种上水稻，收获的稻谷用来弥补县委机关及来往人员的粮食不足。

45年2月初，公馆、白沙党组织坚决贯彻上级关于全面武装起义的指示，由张进煊率领党员和进步青年二、三十人前往大成，参加白石水（大成）起义，陈廷因急病未能参加。他病愈后即随西场起义队伍转移到高雷地区，先后在一团二营、二团二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随部队返原地坚持斗争，曾接替刘守仁同志负责合浦党组织——南路特委的交通员工作，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往返白沙至高雷，送信、送情报。

从46年8月起的两年多时间里，陈廷率领武工队转战在大成金街、六罗洞、马栏、街口坡、五王嶂、猪口山、江子坝等地，开辟新地区，坚持流动收税。48年秋，他参加了合浦党员骨干训练班。训练班由当时的粤桂南工委书记陈华主持，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等理论，以及开辟新区的群众工作的方针、政策。训练班结束后，陈华派他和李明、朱有玃等同志组成合灵南区工委，开辟和巩固合灵南、合钦灵边根据地。

49年陈廷主要负责税收和部队给养工作。年初，他和吴彩佳等奔赴马江口一带，联合小江部队的高芳颐、陈雄（陈家桂）及当时广西属的博白游击队，在南流江上游两岸武装收税。同年夏天，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组建后，六万山地委成立了六万山地方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六万山地区的征粮、征税和部队给养等工作，朱伟任主任，他和李成任副主任。财经委员会统一粮单、税单，广辟税源，增设游击税站，合理征粮征税，除解决第四支队给养外，还千方百计筹粮备草，准备迎接南下大军。陈

廷和同志们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迎来了合浦人民的解放。

建国后，陈廷历任廉州军政委员会财经处主任，合浦县粮食局长，钦廉专署粮食局第二副局长兼合浦县粮食局局长，合浦交通银行主任，灵山县供销社主任，合浦专区供销批发部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湛江地区日杂公司副经理等职。在解放后的三十多年中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陈廷的生活道路坎坷。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下放劳动改造（先后到十余个农场搞重体力劳动）达二十二年。他的亲属也蒙受株连，爱人王其兰无辜被开除出革命队伍，连同子女一起被赶回农村老家。王其兰曾赴京上访十余次，四处奔走呼吁伸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79年，陈廷夫妇的问题才得到平反，一家人有团聚了。但据了解，尚有许多实际问题未能解决，期待有关方面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陈传讚（自传）

我是合浦县廉州镇人，1933年入廉州中学读书，1939年廉中高中毕业。

我在学生时代追求进步，在张存芳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反对奴化教育，反学阉范公镇的斗争。1936年，受“艺宫”进步影响，我和同班同学李辛农，邱鸿就等组织“小萤社”，阅读进步书刊，研究革命理论，出版墙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后，我和李辛农、邱鸿就、庞盛乾等同学，在何世权同志指导下，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奔赴农村办夜校，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此外，我还投资参加了“战时读物供应社”，推销进步书刊，秘密发行中央刊物。1938年8月间，由洪廉光介绍，何世权吸收我入党。

1938年10月间，县成立了抗先队，何世权和我等人去做廉州镇大刀队的思想工作，把这个队的成员吸收入抗先队。在党组织活动中，伍雍娴任组长，我任宣传干事。县组织抗先队，由何世权任政治部主任，王文崐任宣传部长，岑月英任妇女部长，我任总务部长。从事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进行政治斗争，统战工作，武装军事训练，宣传教育，组织救护队，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村工作，以致深入白区争取自卫队，以壮大抗日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冬，抗先队被迫解散后，抗战形势紧迫，王文崐我和王资桐等深入发动廉州群众，参加了抗日“战时服务团”。由王资桐与我分别担任队长、副队长，王文崐任党组长，从事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争取武装，开展敌后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当时廉州所有地下党员，基本北撤，庞达同志通知我留在廉州坚持地下党工作，从此党内工作，转为单线联系，有人来找，以“朝歌”为符号与之联系工作。

1940年3月间黄其江来找我，主要是掩护他的地下活动，四月间党派我到西场由

何世权主持的党训班学习，结束后回廉工作。七月间阮明同志安排我张贴革命标语和散发传单，在我家召开党小组会议，均由我担任保卫工作，以及把各地送来的秘密信件转给阮明。1941年春的一个晚上，阮明布置我到廉州下柴栏街罗建中家里，开会商量秘密张贴和散发反资敌、反逆流等标语传单，当时由我主持与陈乾业、杨衍汉等四人正在开会，不幸被敌人发现，由伪联防保队派壮丁去围捕，抓去三人：陈乾业（在狱中死去）、罗建中、杨衍汉（二人出狱后自谋生涯）。我逃脱后走回家时，在经济上支持罗建中家属。第二天阮明到我家叫我烧毁文件，马上离开廉州，我到福成下佳塘以学医为名，继续革命，宣传抗日，当年五-六月间到北通去找谢王岗接头后，我暂时离开合浦到湛江去，借经商掩蔽。在湛江找到李华良和伍雍娴同志，他两人叫我回廉州坚持地下工作。十一月间我回廉不久，亚红（何雨田）找我联系工作，主要是在工商界人士中秘密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反动派的投降分裂阴谋，唤醒工商界的爱国热忱，拥护党的抗日方针政策。1943年秋，岑焕祥和易志贤先后找我联系工作，在经济上支援山区游击战争。46年秋在车站工作，主要是开展与特务斗争，大概47年12月邱鸿就找我联系，他谈到山区同志医药条件差，叫我在医药上作支持，每次我交钱给他买药外，并向他汇报廉州的反动派活动情况。

解放后朱兰清找我商量工作，安排我在车站任副经理，搞支前工作。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保护了全站财产，完成了支前任务。1952年至58年初，先后任汽车公司经理、工商联主委、政协副主席、省人民代表、还珠中学校长、副县长等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夏被错划为右派，长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人间的“辛酸”痛苦都尝过。“文革”期间被污蔑为“叛徒特务”，到“五七”干校劳动；被隔离审查长达两年之久，不见天日，遭受残酷斗争，身心受到摧残迫害，以致株连家人，惨遭家散人亡，长期被管制劳动。到1979年才纠正错划右派。1980年调到合浦县食品公司任副经理，1981年任县人大副主任，1982年恢复工商联任主委，1983年出席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同年选任区政协委员，区工商联常委，平反后1984年才恢复三八年党籍。总的来说，我能活下去，是党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我要竭尽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

陈符伟

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四六年初入党的陈符伟，在游击战争年代里，当过交通员、战士、“土医官”，默默无闻地坚持了五六年的艰苦斗争，迎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建国后，他刻苦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工作，至今已年近花甲，仍精神抖擞地战斗在第一线。

他是合浦县南康镇粟山村人，1927年10月出生于一贫农家庭。他在苦难的童年、少

年时代，只上过一年学，余则给别人当牧童，十三岁那年到北海替一个中医生做杂工，扫地、烧水、侍候之余，虚心向医生求教，短短的三四年间学会和掌握了不少临床验方，这对他后来参加革命、成为游击队的“医官”帮助很大。

在堂兄陈符隆的影响和教育下，陈符伟于44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当时，陈符隆是中共廉北区组织特派员，公开的身份是南康镇专营海味生意的“成悦”号商店的老板。他经常派陈符伟到各地送信或带路护送过往的领导和同志。次年一月间，陈符隆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陈符隆动员陈符伟参加起义，并鼓励他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

二月三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南康起义的战斗打响了。四十余人的起义队伍怀着克敌制胜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以仅有的八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冒雨袭击拥有先进装备的国民党粤南沿海警备大队机炮中队，共毙伤敌十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九支，子弹九箱。起义后，陈符伟和同志们一起顶风冒雨，踏着泥泞的小路摸黑向白石水转移，当晚到达伞塘檬村后，同陈符隆等同志失去联络。陈符伟奉命与另一位同志返南康联系陈符隆及其他失散人员。

南康起义的枪声，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们下令通缉、四处搜捕我起义人员。陈符伟与陈符隆等五人取得了联系后，分别化装成商人、挑夫，于五日凌晨向白石水进发，准备同大部队汇合，当晚抵达多蕉、常乐、旧州三乡交界的横流水村，突然被当地保队拘留，陈符隆一行机警地骗过保队，安全脱险。为避免人多目标大，陈符隆决定陈符伟三人返南康坚持斗争，待联系上队伍后再通知他们上队。春节过后，陈符伟接到上队通知，他化装成挑盐卖的小贩就出发了。当他到达预定联系地点——大成火石山小铺时，见周围都是敌兵，原来是一五五师自南宁开来“清剿”。他把盐挑到武利圩卖了，再设法联系上队伍，随队转战在合灵边，后又奉命返南康地区搞交通情报工作。解放战争初期，敌四六六团“驻剿”南康地区，我游击队环境恶劣，斗争异常艰苦和残酷，陈符伟经常跋山涉水，到公馆浪坡，六湖洞、白沙龙颈、榄子根和乾江、北海等地送信、送情报，护送同志，为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贡献了力量。

47年夏天二十四团组建后，卢传义、钟景彰等同志安排陈符伟负责医务工作。那时候，部队经费十分有限，药品相当缺乏，陈符伟一方面依靠群众的支持，筹钱买些药品，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挖草药，配验方，给伤病员治伤、治病。遇到敌人扫荡，他冒着危险掩护伤病员安全转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给二、三十名伤员治好了创伤，被领导和同志们誉为“医官”。

解放后，陈符伟先后任南康镇镇长、常乐区委副书记、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农村部副部长，石康区委书记、合浦县县长、钦州地区水产局副局长、合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